

# 西方“情感”概念的结构分析及其历史演绎\*

胡景谱<sup>1,2</sup>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 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公共政策实验室, 长沙 410081)

**摘要:** 古往今来, 西方学者围绕“情感”结构的分析集中在词源、认知、对象、生理和社会等组分, 揭示情感本质(是什么)、内在机制(如何发生)及影响因素(何以不同)三重问题, 为人们理解情感本质及其普遍性提供了逻辑进路。其中, 词源结构解析“情感”概念的语义历史流变, 回答“情感是什么”的认知框架问题; 认知结构通过情智关系悖论探讨情感生成的神经-心理机制; 对象结构以分类学方法解析情感类型的普遍性与文化特异性; 生理结构基于器官分工原理揭示情感发生的生物学基础; 社会结构从文化情境与权力关系角度阐明情感的社会建构性。这五重结构共同构成理解情感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分析框架, 为破解“人工情感”的哲学与技术难题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情感; 结构分析; 历史演绎; 情智关系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5)03-0212-08

虽然人类关于“情感”概念的认识和描述几乎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但是人类从古至今对其研究都处于某种“经验”之中。长久以来, 人们虽然能够轻易从具体情境中对情感状态进行描述, 但却难以给出一个抽象普适的概念, 既难以充分论证“情感”的普遍性, 也没有形成关于“情感”的共识。由于“情感”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且至今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因此, “情感”也被西方学界认为是极具历史性的概念。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 情感作为适应环境、激发动机、组织行为、传递信号的功能属性逐渐为人们所认知。这种跨时空的功能稳定性与行为可预测性, 促使西方学者反思情感的诸多功能的实现背后或许拥有独特的结构和机理。西方学者试图揭示人的情感的可语言化、符号化、形式化、可计算等表现, 他们从情感的词源结构、认知结构、对象结构、生理结构和社会结构中, 找到情感真正属于自身的普遍性。这对于当代人机交互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因为如果不能表征普遍意义上的情感, 也就不能真正人工制造出情感。为此, 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对“情感”概念的组成结构进行西方哲学史的回溯, 探索“情感”结构背后的发生原理及其逻辑关系, 能够为对人类情感进行本体透视、增进人对自身情感更全

面、更深刻的认识等奠定前提性基础。

## 1 词源结构: 基于语义原理的情感释义

词源结构通过跨语言语义比较, 揭示“情感”概念的历史建构性, 直接回应“情感是什么”的元问题。西方关于“情感”概念的词源结构考察是基于对不同语言中“情感”的语义进行溯源, 探究“情感”这一词语的词源和词形演变, 同时对西方不同时期的不同词形背后的核心信息进行全面了解, 在词义的历时嬗变中理解“情感”概念的现代意义的由来。通常可以从“情感”概念在古希腊语、拉丁语及其对应的现代英语中进行把握, 但同时也不能将个别词汇的释义绝对化, 不能机械地割裂表征“情感”的不同词汇相互之间的关联。对于“情感”概念的词源结构分析是期待相对把握情感释义, 因此, 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词汇的使用情境中对其加以理解。

在柏拉图的《德性论》中也有关于“情感”(patho)的论述, 在他这里的情感属于感觉经验, 通常被译为“感受”(feeling)、“情绪”(emotion)或“情感”(affection)等组分, 重在强调个体的感觉经验和心理经验, 主要归属于非理性的范畴(Plato, 2002)。柏拉图关于“情感”概念的使用,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情感经验, 分别对应心灵中的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 其中欲望部分产生的情感是生理性的感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技术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24&ZD173)。

通信作者: 胡景谱, E-mail: hujingpu@qq.com。

官体验,主要有快乐和痛苦两种基本情感经验;激情部分产生的情感是表征对事物的特定复杂感受,如恐惧、愤怒等;理性部分产生的情感与理性对经验事物的判断相关,他这里只介绍了“愉悦”这一种情感,是区别于生理愉悦而存在的,来自对事物理性观察和思考的“纯粹的快乐”。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论灵魂的三种状态时提到“情感”(πάθος/pathos),在后来的译本中,诸如罗斯(W. D. Ross)、巴莱特(Robert C. Bartlett)和廖申白等,都把(πάθος/pathos)译作 passions,中译本对应的译为“情感”,但希腊语(πάθος/pathos)的原意则具有包含“情感”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内涵,例如它的派生动词 πα`σχω/ paskho 就具有“承受、遭受”或“经验、体验”等意涵。

在中世纪的古希腊语中,表征“情感”的词汇 παθήμων (pathōn) 翻译成拉丁文中的 passio (即古拉丁语中的 pati) 和 affectus;前者包含表示被动的词根,表示对于环境刺激的被动应激。在现代英语释义中,Emotion 显示出一种“即时感”,在“Emotions are running high”中它表现的是群体因某一事件而“群情激愤”,而在“The decision was based on emotion rather than rational thought”中,Emotion 显然是与理性相对的概念,因而被理解为“感情的”或者“情绪化的”,是一种(多重)外显的情绪。与 Emotion 相对的 Mood,表征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诸如脾气、心情等,与 Emotion 的“即时感”相比,Mood 通常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甚至是作为个体性格而长期存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天气”和“气候”。作为名词 affection 不太适合用于解释“情感”,与其他表征“情感”的概括性抽象词汇相比,affection 更像一种具象的情感,即一种关于喜爱的情感或态度,因此它从属于 feeling,具体说来就是“the feeling of liking or loving sb/sth very much and caring about them”。而 affection 的形容词 affective 反而更适合,它被认为是 connected with emotions and attitudes,即一个与情感和态度相关的概念,它凸显的是一种态度和倾向。

从情感的词源结构看,西方关于“情感”概念的理解具有不同语言之间的横向比较和发展脉络的纵向比较两个层面的意义,同时也便于得出一个相对简洁且明确的“情感”概念。纵观情感词源结构的西方历史发展脉络可知,西方构词中表现出的“情动”思想是从人体本身的意识和感官出发,揭示情

感本质与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关系;同时,西方几类具有代表性的语言关于情感的被动结构殊途同归,都表征着人对事物的特定复杂感受,揭示了情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将西方“情感”相关概念加以综合,是对传统“感知”与“理性”二元对立的突破与调和。

## 2 认知结构:基于悖论原理的情智关系

认知结构聚焦情感与理性的交互机制,试图回答“情感如何发生”的核心问题。长久以来,“情智关系”都以悖论的形式存在,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认知占据理性领域,情感占据非理性领域,情感具有非意识性(nonconscious)而与理性二分。即便如此,关于“情感”的准确定义至今依然存在困难。关于情感的知识是怎么产生的,人们是怎么认识情感的?经验还是先验?是否具有普遍性?对“情智关系”这一古老命题的分析,既能反思关于情感的知识如何产生,又能在人类认知过程中解析情感在其中产生的影响。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分析道德判断的产生时区分了理性与移情,他认为道德观点是在经验中建构起来的,因而道德判断的基础是移情而非理性(斯洛特,2017)。认知主义建构论认为,情感具有显著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情感的唤醒和体验是通过大脑-身体所关联的一种快速且自动触发的先天设定机制,因而意识的介入并非情感产生的必要条件。例如,汤金斯(Tomkins)等认为身体中存在若干种基本情感,它们被大脑的特定程序所控制,当受到某种信号的刺激时,程序自动启动,使人的面部、肢体和身体激素水平等产生一系列特定的行为反应。此外,神经学家约瑟夫·杜勒(Joseph Dueler)也指出,并不是每一次情感的发生都需要经过逻辑认知,认知活动必须经由大脑,而情感发生则是身体反应与大脑综合信息的结果,由此证明认知与情感的相对独立性。一方面,他从思维层面指出,逻辑认知参与情感活动仅在初次或者初始几次时是必要条件,而情感的“再现”并不以此为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他从生理机制上证明情感与认知分属于机体的不同组织部位,因而认为情感也可以在无知觉意识和无认知加工的情况下产生。

在西方思想史中,也有将情感作为一种特殊理性,认为情感具有分有理性特征的观点。一方面,情感是可以被认知的。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则认为人们的情感并非与认知毫无关系,她提出的“情感管理”理论就基于人们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情感体验从而进行管理(霍

克希尔德,2020)。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情感的意向内容倒推情感状态的意向性。而情智悖论的观点之所以会认为,情感与认知二分,是因为被二者之间存在的非充分决定性的对应关系所遮蔽。因为情感与认知二者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的复杂交叉关系(卓菲娅丽莎,1980),即相同的情感可以产生不同的概念,而相同的概念同样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另一方面,情感可以辅助认知。情感作为适应性行为而出现,必然隐藏了大量的认知信息。人的实践活动包含“合情”“合理”的评判尺度,其中“合理”是指通过逻辑推断获得程序上的确证,而“合情”则包含了实践行为发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人的任意一个实践行为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理性推论,必然介入了主体间的情感沟通。也正是情感对认知活动的介入,才使得基于情感沟通的外推实践活动既体现逻辑形式上的正当性,又体现价值主张上的合理性,还能展现一定的人文温度。由此可见,情感与认知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认知予以情感发挥的空间,而情感促进认知的具象化。

关于情智关系的认知,还需要检验情感是否具有先验性质。从康德的先验论中即可初窥堂奥,即便康德认为大多数情感都是由经验建构的,但这也不代表康德对情感先验的绝对否定。恰恰是因为康德对情感能力的经验考量,推进了关于情感先验与情感经验关系的思考。而海德格尔、舍勒的先验思想中也已经强调过情感先验,但“情感先验”概念的正式提出,还是来自法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在杜夫海纳这里,他将情感先验分为情感特质与情感范畴两个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也并非完全是先天的,而且他也承认情感的知识也是从情感的经验开始的(米·杜夫海纳,1992)。因此,他认为,在情感特质中的先验性主要体现在先天的符号叙述能力,而且这种叙述能力也被后来的神经科学和生物进化等证实。然而这种符号叙述能力并非与生俱来就一成不变的,更是因为有了后天情感经验的参与,人们的符号叙述能力才变得更加复杂高级而富有层次。而关于情感范畴的先验性,杜夫海纳认为情感范畴不是天生的范畴,仅有“快感”和“痛感”两种范畴是天生的;而且他还指出,多数情感尤其是复杂的高级情感必须基于一定的情感经验才能被体验到,但是这些复杂的高级情感最终还是可以归结到“快感”与“痛感”两种范畴中加以解释。由此可见,情感是情感先验与

情感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此二者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促成、相互制约。

关于情感的认知结构的历史发展,西方历来主张“情感”与“理性”二分,鲜明地指出情感的非意识性,即便也有关于“情感分有理性”的论述,但这里也依然强调了“情感”的非理性特征以及认知在“情感”中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来说,西方的“情感”概念都承认了“情感”与“理性”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都认识到“认知”在情感理解和情感表达当中的作用。

### 3 对象结构:基于分类原理的情感范畴

对象结构通过分类学方法解析情感类型的普遍性与特异性,直接回应“情感是什么”的本质问题中的类型学维度。在情感经验的参与下,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情感类型,从而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能够对情境事件作出应答,且形成相对稳定的反应机制。因此,基于分类学原理,将“情感”拆分为若干种基本情感或者设定情感的若干种原始种类的方式,是古往今来的西方情感思想研究者对情感结构最为常见的解构方式,由此也形成了西方哲学心理学中经典的“基础情绪理论”。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及其心理学流派将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某种(些)诸如“水”“气”“火”“阿派朗”等要素概念的思想,就已初具分类学倾向。最早明确使用基本情感类型来表征人类心理活动的思想或散见于恩培多克勒的“同类相知说”,在这里,他选取“爱”与“恨”作为两种基本情感,并将它们界定为具有理想化特征的相互作用模式。因此,他的情感分类理论也被认为是最早重视心理学动因思想的。而伊壁鸠鲁使用的是“快乐”与“痛苦”两种基本情感,他指出“一切感觉都伴随有痛苦或快乐感情”,他注重心理体验和生理体验(生物功能)的区别,因此,在他的情感理论中区分了身体的快乐和灵魂的快乐,并指出“灵魂的快乐高于身体的快乐”。而在柏拉图理念论情感思想中,将情感划分为愉悦的和不愉悦的两种原始类型,以“合乎自然”与“合乎运动目的”为标准,正向运动为趋于愉悦的,负向运动为趋于不愉悦的,两个方向运动的程度不同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情感。在生机论心理学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这里,他将人的心灵划分为两大官能,其中欲求官能即表征情感的官能,包括愉快和不愉快的感情和意志作用(即强烈的欲求),这可以看作是他对情感基本类型的划分;此外,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罗列美德表时提出了“羞耻、节制、义

愤”等表征情感的美德类型。然而遗憾地是,这些美德既不能直接等同于情感,同时也没有试图穷尽所有可能的基本类型,相对来说比较松散。

到中世纪神学官能心理学阶段,奥古斯丁将所有情感归结为一种基本情感,即“爱”。而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情感的分类学原理形成了系统的论述:首先,他的情感原色依然是“爱”,在他看来,各种情感都以“爱”为中心,并产生于“爱”,它们之间有发生学上的秩序与合乎逻辑的结构;其次,依据“不同的潜能对应不同的形式对象”的原理,将情感区分为欲望情感和愤怒情感两种原始种类(Thomas, 1963),情感以趋于善或恶为标准,呈现出逐步对立或逐步递进两种关系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情感,其中,欲望情感的形式对象是绝对意义上的感性善与恶,愤怒情感的形式对象是困难和阻碍意义上的善与恶;再次,根据情感趋于善或恶的运动原理,托马斯又将情感划分为11种基本类型,其中欲望情感分配了6种3组对立情感,即爱与恨、欲求与厌恶、快乐与悲伤,而愤怒情感分配了5种,其中包含2组对立情感,即希望与绝望、畏惧与勇敢,最后还有一种没有对立面的愤怒情感。最后,托马斯用这11种情感类型的先后顺序揭示了分类对象的结构关系,他根据运动分析,指出爱恨是所有情感的开始,喜与悲是所有情感的终结,欲求与厌恶和所有愤怒情感表示变化的情感类型。

在近代哲学心理学史中,经验主义代表人物霍布斯在揭示身体感知觉运动时指出了情感的两大基本要素——快乐与痛苦。从某种程度看,霍布斯的情感分类体系呈现出对伊壁鸠鲁原子论传统与托马斯运动原理的辩证融合:在基本情感单元的划分上延续伊壁鸠鲁的简约化路径,而在情感动力机制的解释维度,则通过生命攸关的运动促发情感质变的理论模型,与托马斯关于心灵运动的情感生成原理构成了跨越哲学范式的深层对话。而理性主义代表人物笛卡尔选择惊奇、爱、恨、愉快、悲伤、渴望作为6种原始情感,他称之为6种基本激情(Descartes, 1985),并指出人类所有情感的产生都可以由这6种基本激情通过“化学混合”实现完整地运作;他认为,人类各种情感的运作方式是从外物对身体感官的刺激开始,其效果取决于知识的对错。斯宾诺莎强调理智功能和理性直观,揭示理性在主动情感和意志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把情感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欲望,即人意识到的努力行为的趋向;快乐,即欲望得到满足,作为获得成功的感情;痛苦,

即欲望未得到满足,作为失败的感情。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派倾向于把人类众多的情感归结为内在情感和外在情感两大类。在他们看来,那些通过外部生理水平能够捕捉到的情感,特别是通过面部表情直接表露出来的情感即外在情感,这类情感具有易变性、情境性和外显性等特点;相比之下,内在情感则通常是指基于情感经验而来的具有长期稳定性、内隐性和持久性的情感。美国心理学家劳拉·E·伯克(Laura E. Berk)根据是否涉及自我意识将人类情感分为基本情感和自我意识情感,其中基本情感是指那些从面部表情即可直接推理出来的情感,诸如喜怒哀惧等,她认为这些情感具有促进人类生存进化的作用,且普遍存在于灵长类动物之中;而自我意识情感通常是指那些会对人的自我意识产生影响(加强或者削弱)的高级情感,例如羞怯、窘迫、内疚、嫉妒和自豪等(贝克, 2014)。

从情感对象结构的历史发展脉络可知,西方学者将人类情感按照其共性和差异进行划分,以及对情感分类标准进行选取,是为了将复杂的情感现象还原为基本的情感类型,并试图探索不同类型之间的交互变换关系,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情感的本质与发生机制。西方情感分类思想中还拓展了内外情感的划分,为通过人工手段“制造”类人情感提供了基础性参考。然而,关于情感对象结构的分析,从情感的分类标准上确定了情感的“内涵”、从符合“情感”标准的事物描述上确定了情感的“外延”,虽然对于理解“情感”概念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果分类是不完全归纳,那么似乎只回答了“什么是情感”,而没有回答“情感是什么”。

#### 4 生理结构:基于分工原理的情感器官

生理结构以人体器官分工为切入点,通过神经解剖学与认知神经科学证据,破解“情感如何发生”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关于情感的生理结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人类的情感与生物学保持着密切且重要的联系,人类基本情感均具有特定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或者说人类的器官存在一定的分工使部分器官承担了情感功能。

自古希腊时期,很多人就坚信情感具有一定的物质基质和载体,只是人类对此的认知进展十分漫长,古希腊哲学心理学重要假说“普纽玛说”就承载着这种愿景。普纽玛(pneuma)最早被解释为气、呼吸等概念,它的运动过程将人的灵魂与身体感官结合起来,而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就涉及特定的器官。

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普纽玛运动的起始器官是心脏,而斯多亚学派等认为普纽玛是一种“执行心理活动功能的物质本体”,与血液这一器官组织混合,随着血液流动游走于人类周身循环往复。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推测有一种普纽玛作为一种活体精气从人的“肺部进入心脏,通过动脉游弋全身”。而二世纪的盖伦基于人类“神经”的发现,将心理普纽玛划分为“末梢普纽玛(遍布于神经通路)和中枢普纽玛(运动于大脑中枢)”。由此可见,普纽玛本身不是情感器官,它更像是一种介质或者动力,通过运动过程将觉知、预测到的器官变化的心理特性传输给灵魂。

而在神经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东西方,都一度盛行着“灵魂器官说”,这里所说的“灵魂”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情感”,但是也涉及到关于情感的部分范畴。关于以“心脏”为中心还是以“脑”为中心的问题,一直是“灵魂器官说”争论不休的话题。持“心理中心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是心理的器官和意识的中枢”,并指出心脏具有“指挥力”;而斯多亚派也认为心脏是灵魂的统治部位,能够行使“感情和意志”等心理职能。随着解剖学的发展,“大脑中心论”逐渐占据主流,部分观点甚至已经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讨论。不管是基于观察和臆测的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还是根据解剖和实验的阿尔克莽、希波克拉底以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等,都认为大脑才是“整个心理活动的器官”。尤其是古希腊医师阿尔克莽通过对动物解剖指出,“感觉是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而大脑正是传递视听嗅触觉的器官,并通过这些感觉产生心象。希波克拉底也认为,大脑能够让人类感知美丑、适意,产生“恐惧、惊悚”等情感。而盖伦虽然坚持“大脑中心论”,但他所区分的情感器官却不是大脑,而是“心肝二脏”,他认为“情、欲”是人类非理性灵魂功能,其中心脏承载着“愤怒与勇敢”、肝脏承载着“情欲和温柔”等情感。而在希波克拉底“体液说”的基础之上,盖伦还创建了“气质学说”,这里将“体液”作为一种人体性质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的不同组合及其比例的差别会影响人的情感,在盖伦这里,气质一共被分为13种,不同配比可以产生出诸如“冷静、迟缓、活泼、暴躁、忧郁”等情感,后来的现代科学也确证了“气质”与人类内分泌腺体及其化学机制的关系。

随着情感发生过程与神经科学的关系逐渐被揭示,近代生理心理学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极

具代表性的当数瑞士哲学家波纳(Chares Bonnet)提出的“器官分工说”,他主张“不同的感官适应不同的物质刺激,而每一感官又有不同的分工”(车文博,2010)。例如,耳朵的弯曲管道及其内部构造是为了适应机械波的刺激,以此转化为听觉神经信号传输给大脑;而眼睛的凝胶状球体结构也是为了适应光线的刺激,以此转化为视觉神经信号传输给大脑。以此类推,外界的情境活动及其情感刺激,是否存在专门的“情感器官”与之相适应?法国思想家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将“脑看成一个专门生产思想的特殊器官”,他认为,“感觉和意识等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神经系统的机能和脑的特性”,同时,他对神经系统的高低层次划分,也为“情感的发生并不总是需要逻辑认知的参与”这一哲学命题的成立给出了生理学证据。此外,卡巴尼斯对参与人体内脏、肌肉等器官的感觉进行研究,并由此提出“内部感觉说”,他指出许多内部感觉虽然大脑意识不到,但是却能对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况产生作用。苏格兰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在分析人类心灵的五种“天然能力”时指出,情感的产生需要感官的参与,但是将情感的来源与某种感官划上等号会混淆情感与感知觉的概念(哈奇森,2009)。他认为,情感的感官属于一种内感官,它不需要直接与外界发生联系或者互动,而由具有感知觉能力的感官将其带入在场。直至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将生物有机论和社会学立场结合,以此建立了情感与生物学的联系。在柯林斯看来,大脑当中的某些特定区域承担了人类的基本情感的生理基础,但是光有此基础是不够的,情感的发生还需要通过社会互动形成特定情境下的因果关系,身体在场的生理基础只是充分条件(柯林斯,2009)。

著名的“詹姆斯——兰格情感理论”(James - Lange Theory of Emotions)的联合创立者实用主义心理学家詹姆斯(W. James)和丹麦心理学家兰格(C. G. Lange)认为,情感体验的作用机制是综合的、复杂的,但他们同时也指出了情感体验的生理机制,即神经生理放电过程。这一观点既是生理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同时也是身心统一的佐证,因为神经系统与情境体验等所形成的整体才保证了情感体验的产生。当代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针对情感影响人类道德判断的生理机制提出了“社会直觉模型”(2007),该模型对人体大脑进行了区域划分,并详细描述了前额叶、杏仁核、脑岛等组织

对应管理情绪的情况(Haidt,2008)。而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提出的“双系统加工模型”(2008)则针对大脑区域进一步区分,他这里所说的双系统即大脑中的“背侧系统X和腹侧系统C”,这两个系统之间相对分离且不断竞争,分别承担着类似于“理性推理判断”和“道义论判断”的功能(Joshua,2008)。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将情感的生理机制归结为一种预先设置的生物学装置,而意向对象则是外在于该装置的情感诱导物。情感诱导物通过机体感觉器官的参与被人类所获取,然后经由相关神经部位(前额叶、腹内侧皮质、杏仁核、脑干等)等将视听触觉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而得以加工,最后再通过神经系统向人体其他应答器官发送信号继而被人所意识到(达马西奥,2007)。

纵观情感生理结构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没有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尤其是解剖学和神经科学等)的支撑之前,西方思想家们关于情感生理结构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主观臆断性,他们试图援用生命科学发展的成果来揭示情感发生的生理机制,但似乎也没有形成共识。即便如此,西方关于“灵肉关系”“身心关系”等的探讨都足以证明,他们关于情感的研究都承认情感具有特定的生理基础,这对于我们从身心关系维度理解情感具有重要启示。

### 5 社会结构:基于文化原理的情境体验

社会结构通过权力关系、文化符号与制度实践的解构,阐明“情感何以不同”的社会建构性问题。情感活动的发生是以脑为中心的神经系统的机能反应,人类的基本情感具有一定的生理学基础等观点已经逐步成为当代情感研究的共识,因而关于情感决定性因素的反思逐渐成为近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但不管何种流派,似乎都承认了情感具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然而,这里讨论的情感不是将人类的基本情感类型机械地划分为社会性情感和生理性(本能性)情感,而是指一种情感的产生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性和生理性的要素,强调情感的社会结构是在强调社会结构对情感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情感的社会结构也由人们在情境体验中获得的情感经验积累而成,而人们要获得深层次复杂高级的情感体验时,自然也离不开从小到大所建立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地位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

感觉”(马克思,2000)。人类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接受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成就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会使他们在特定的情境中体验到不同的社会情感,这种复杂的情感现象是因人而异、难以描述且不能完全感同身受的。关于情感的社会结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坚持“情感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的观点(Hochschild,1979),她认为社会规则是影响人们情感体验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情感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暂且搁置建构主义对情感与生理过程的关系分析,把目光聚焦于建构主义者对情感的文化分析。建构主义者通常比较关注社会是如何通过文本、词汇、语法、观点等文化规范来实现对情感的调节,因此他们认为,情感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之中通过特定情境才能被体验到。其中,埃利亚斯(Elias)的文化分析就注重阶层文化对情感的印象,他指出不同权力层级中的人具有特定的情感感受方式,由此,他也开启了一条通过社会型构来分析情感的进路(诺贝特,2009)。而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西奥多·肯普尔(Theodore Kemper)尽管揭示了情感神经机制差异与社会结构间的互构关系,但他也指出除了一些基本情感之外,仍有诸多重要的社会情感受文化性力量的影响,这些文化也包括种族文化、职业文化、性别文化等社会变量。因此,肯普尔认为由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所决定的社会结构是决定人们情感体验的关键因素,从社会结构中理解的情感是一种深受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文化规则影响的较为稳定、持续、内在的情感体验,具有社会信号、社会运行的动力、社会行为调节和团结社会等功能(Kemper,1981)。

情感的社会结构注重对情感的实践特征的内涵诠释,主张将对情感的理解放诸于具有稳定性质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背景之中,同时也在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应对的文化情境中考量情感。乔纳斯·特纳(Jonathan H. Turner)从而指出,情感是文化、社会结构、认知以及生物力量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亦是社会文化符号系统运行的基础(特纳,2007),并指向对“人”主体性的呼唤。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行动主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符号指向以及主观体验。基于情感的实践性,爱德华(Edward. R)提出了情感的可分享性和可传承性特征,子代在家庭之外将习惯性地采用他们从父辈处习得的情感体验和情

感表达方式(Edward, 1984),尤其是在家族代际之间传递的情感更接近一种社会性发展遗传。这里所说的“遗传”无意去探讨情感遗传的生理学基础,而是试图揭示由于家族之中具有共同的或者相近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宗族文化背景,从而使得后代在社会情感的生成中从这一社会情境中得以一定程度的继承,从而表现出代际“遗传”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认为“情感结构”是一种动态性的社会经验(雷蒙德,1961),他强调“情感结构”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实践,从而将文化纳入整个物质性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使“情感结构”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相关;同时,他也认为“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化假设,体现着某个特定时期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即一个时期的文化,因此使“情感结构”成为一种文化分析的工具(雷蒙德,2008)。只不过,威廉斯所说的情感结构针对“类”“群体”而言的,他强调的是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生活的整体感受;而我们讨论的情感结构则是针对个体而言的,然而从群体社会情感中更能挖掘社会结构对情感长远、稳定而明确的影响。

情感社会结构的存在,引发了人们关于“为什么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的追求。正如乔纳斯·特纳所说,情感体验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是存在差异的。由于社会分层、世界参差,进而型塑了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个体情境体验的独特性(Turner, 2010),也就是说他们被分配到的情感本身的参差导致了情感的分层。从社会分层上看,由于个体在社会资源、权力、地位上占有的不同,从而使其在情感体验上存在结构性差异。但是这种类似于需求层次满足的情感分层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而且也不是社会情感分层的症结。关键在于社会分层导致了不同的层级对情感资源占有存在差异,又因为社会情境体验制约了社会认知,因此诸如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社会分工等指标的不同导致了情感分层的出现。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Willem Doise)所划分的4种分析水平中就指出,个体社会认知、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行为、社会人际交往水平、社会成员的信念、表征体系、价值观和规范等(杜瓦斯,2011),都关系着人们社会需求的满足和社会情感的体验效果。因此,社会结构也以一种动力引擎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社会情感体验,而“情感”领域的变动对于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建构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 6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心理学史上关于“情感”概念的不同“结构”解析方法之间,在思维方式、标准选择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它们之间并非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每一种结构分析都为我们从复杂多样的“情感”概念中寻求普遍性,提供了有益参考。单一结构的分析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词源结构事实上仅停留在人类关于“情感”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层面、认知结构也尚未调和“情智悖论”、对象结构的不完全归纳倾向带来了一定的或然性、生理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也必然需要有机统一。因此,情感研究需超越单一结构的解释局限,在词源、认知、对象、生理与社会结构的协同中,实现本质、机制与影响因素的三重穿透。这种多维透视不仅深化了对情感复杂性的认知,更在人机交互伦理、社会情感治理等领域具有应用价值。只有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多种结构分析方法,才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把握“情感”。尤其是在“人工情感”呼之欲出的智能文明时代,对于“情感”这一历史概念,从特定结构及其生成秩序中寻求人类情感的普遍性,必将为现代技术的情感设计奠定前提性哲学依据和规律性科学基础。

## 参考文献

- 埃利亚斯·诺贝特. (2009).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 等译, p. 3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2007). 感受发生的一切(杨韶刚 译, pp. 30-35). 教育科学出版社.
- 车文博. (2010). 车文博文集(第三卷)西方哲学心理学思想史(p. 184).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弗朗西斯·哈奇森. (2009). 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 & 表现, 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戴茂堂 等译, p. 5). 浙江大学出版社.
- 霍克希尔德. (2020). 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 等译, p. 267). 上海三联书店.
- 黄超. (2016). 托马斯·阿奎那情感理论研究(p. 56). 人民出版社.
- 柯林斯. (2009). 互动仪式链(林聚任 等译, p. 154). 商务印书馆.
- 劳拉·E·贝克. (2014). 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桑标 等译, p. 324).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雷蒙德·威廉斯. (2008).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 译, p. 1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马克思. (2000).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pp. 87-88). 人民



- 出版社.
- 迈克尔·斯洛特,等.(2017).中国哲学与现代情感哲学:迈克尔·斯洛特教授访谈录.《当代儒学》,(2),1.
- 米·杜夫海纳.(1992).《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pp.480-481).文化艺术出版社.
- 乔纳斯·特纳,简·斯黛兹.(2007).《情感社会学》(孙俊才等译,p.217).上海人民出版社.
- 威廉·杜瓦斯.(2011).《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赵蜜等译,p.2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卓菲娅丽莎.(1980).《论音乐的特殊性》(于润洋译,p.69).上海文艺出版社.
- Descartes. (1985).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Dugald Murdoch & Anthony Kenny, p.3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R., Manstead, A. S. R., & Macdonald, C. J. (198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sociometric status and ability to recognize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235-238.
- Haidt, J., & Bjorklund, F. (2008). Social Intuitionists Reason In Conversation. In W. Sinnott-Armstrong (Ed.), *Moral Psychology Volume 2: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Morality: Intuition and Diversity* (pp. 241-25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79).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3), 551-575.
- Joshua, G. (2008).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7(3), 1144-1154.
- Kobert, D. M., & Kenny, A. (Eds.). (1985).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 & Stoothoff, p.3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mper, T. D. (1981).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nd positivist approaches to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2), 336-362.
- Plato. (2022). *Five Dialogues* (Translated by G. M. A. Grube, p.88).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Raymond, W.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p.63).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Turner, J. H. (2010). The stratification of emotions: Some preliminary generalizations. *Sociological Inquiry*, 80(2), 168-199.

##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De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otion” in the West

Hu Jingpu<sup>1,2</sup>

(1. Chinese Eth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2.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Laborator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Throughout history, Western scholars have focused their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emotion” on components such as etymology, cognition, objects, physiology, and society,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emotion (what it is), internal mechanisms (how it occur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hy they are different), providing a logical approach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and universality of emotion. Among them, the etymologic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otion” answers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question of “what is emotio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explores the neuro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generation through the paradox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Using taxonomic methods to analyze the universality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emotional types in object structures; The physiological structure reveals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rgan division of labor; The social structure elucidates the social constructiveness of emo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power relations. These five structures together for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emotion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the philosophical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emotions”.

**Key words:** emotions; structural analysis; universal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relationship